

斯大林論 國際合作與國際條約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法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三年

D50
L1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國際法教研室
Кафед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斯大林論國際合作與國際條約

Сталин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между-
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ах

摘錄自聯共中央對蘇聯社會科學院國際法教研室編學報第九期
法學碩士學位論文《蘇聯國際法學》(1953年)第100頁

Актов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 при ВКП (б)
кафедр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о права архивные записки, № 9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Д. А. Райцунова. 1 вып. 1950 г. Москва.

北京 一九五三年 ★ г. ПЕКИН, 1953 г.

5/17/03

書號：外2—8

斯大林論國際合作與國際條約

著者： 蘇 聯 杜 科 夫

譯者：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國 際 法 教 研 室

出版者：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印刷者：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印 刷 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571(470+99+2002)

斯大林論國際合作與國際條約

法學碩士 A·A·蓋杜科夫

不論各國政治制度之間的差異多麼大，民族和國家都不能彼此孤立地存在。在各種領域——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內，伴隨着鬥爭和競賽的國際合作，是國際交往底必要條件和內容。

蘇維埃國家從來不想把自己孤立起來；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表示了在建立公正的、民主的和約的事業中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意願。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的和平法令。該法令建議各交戰國政府和人民立即締結休戰協定，並開始媾和談判，因為簽訂和約不僅是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俄國勞動羣衆所迫切期待的，而且也是所有交戰國中被戰爭弄得窮困萬分、並飽受戰爭折磨的大多數勞動人民所迫切期待的。然而年青的蘇維埃國家要求和平合作的願望沒有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尤其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三年的過程中還繼續耗費了無數人力財力，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被資本主義國

家包圍的蘇維埃共和國遭受這些國家底侵犯。我國的敵人認爲：蘇維埃俄羅斯在這種侵犯面前是站不住腳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存在於資本主義包圍中，是根本不可思議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列寧在第九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道：「不論從政治方面或軍事方面來看，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政治方面和軍事方面這都是可能的，這已被證明，這已經是事實。那末在貿易方面怎樣呢？在經濟流轉方面怎樣呢？與工業先進的富有的資本主義強國集團進行有利於落後的破產的農業俄國的聯系，幫助和交換——這可能嗎？難道他們不會用鐵絲網包圍我們，以及因而不存在任何經濟關係來威脅我們嗎？「他們不怕戰爭，那末我們就用封鎖來戰勝他們」……。

……關於封鎖，經驗證明，它究竟對誰更爲困難：是對被封鎖者呢，還是對封鎖者呢，還不知道。」（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一二〇頁。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二六頁）
經濟封鎖對於封鎖蘇維埃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強國更爲困難，其結果是這樣，還在一九二一年底，「俄國，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發生了一系列頗爲正常的、經常的貿易關係，商務代表處和商務條件等等」（同上）。

儘管資本主義國家獸性般地仇視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但它們還是樂於與蘇維埃俄羅斯建立和發展經濟聯系的。斯大林同志早在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年代，就已經指出這種樂意的情況。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斯大林同志在其向共產黨格魯吉亞梯弗里斯組織全體會議的報告中

說過：

「既然蘇維埃各國擁有廣大原料和燃料底產地，而工業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正缺乏這些，那末，無疑地，資產階級國家中某些資本主義集團爲了在某種條件下利用原料和燃料產地，就樂意與蘇維埃國家達成協議。」（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九一頁）

這種樂意是雙方面的。斯大林同志接着說：「從自己方面來說，蘇維埃政權同樣樂意與外國某些資本主義集團達成暫時的協議……」（同上）

隨後幾年中，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主要是貿易關係）在繼續不斷地發展。誠然，資本主義國家底統治集團起初會夢想：與蘇維埃共和國的貿易關係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俄國資本主義的復辟。例如當時英國政府的首相勞合·喬治就有過這種念頭；一九二〇年二月他在一篇演說中宣稱：如果不能以武力恢復俄國，那末藉助於貿易與簡單的算術就能辦到，貿易是需要算術的，而算術就會很快地消滅「野蠻的理論」。

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加強了外國資產階級使蘇維埃制度蛻化爲資本主義的幻想。但是，衆所週知，這些幻想是絕不會實現的。算術也好，其他更強硬的手段也好，都無能爲力。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最初幾個月，我們已經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並且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用法令在法律上鞏固了它；我們從過去一直到目前都在這個基礎上調整對外貿易合同。

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業務聯系和締結協定時，蘇維埃國家從來絲毫也不放棄社會主義底原則和利益。一九二七年九月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向斯大林同志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哪種程度裏，蘇聯可以和別國底資本主義工業合作？對於這種合作是否有一定的界限……？』當時斯大林同志這樣回答這個問題：『界限是由那彼此競賽着的與鬥爭着的兩個制度間的對立形勢所決定的。在這兩個制度所容許的範圍內，但祇是在這種範圍內，協定才是完全可能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二二——一二三頁。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三卷，第六八頁）

當蘇聯結束了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進入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時，立刻開始與外界建立並發展業務聯系。當資本主義國家試探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並相信它的穩固之後，便開始爭先恐後地與蘇維埃國家恢復外交的和貿易的關係。

在這方面特別突出的一年是一九二四年，它是蘇聯被外國承認的『承認年』。在這一年中，與英國、意大利、法國、挪威、奧地利和中國等國家恢復了外交關係。承認的同時，又隨着締結了一般的以及貿易的條約和協定，而且在一系列的場合下，後者往往先於法律的承認（De jure）（例如與英國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就締結了貿易協定）。在此後的數年中，承認蘇聯並與它建立外交和經濟關係者一個個接踵而來。

在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開始時，有二十八個國家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過程中及戰後，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威信愈加提高，目前（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止），蘇聯已與五十五個國家保持着外交關係。

美國是資本主義大國中拒不承認蘇聯最久的國家，美國的統治集團整整費了十六年，才相信這種不承認的過分拖延，對美國本身並無好處。不過，蘇聯與美國之間雖沒有外交關係，但這對於建立兩國間的業務聯系並非不可克服的障礙；美國資產階級雖然「拒絕」對蘇聯作國際法上的承認，但却與蘇聯進行貿易。蘇聯和美國之間正常關係的恢復，促進了兩國之間貿易聯系的鞏固，並建立了「彼此合作的基礎」（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見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八〇頁）。

與所有民族和國家和平與友好的合作，是蘇維埃對外政策最重要和堅持不渝的原則。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在由於戰後國際政治中發生了嚴重分歧的兩種對立的趨向而使蘇聯一方與美國和英國另一方之間的關係重趨緊張時，英美的社會活動家曾屢次請求斯大林同志解釋合作問題。雖然蘇聯在這方面的立場從來沒有任何使人懷疑的可資藉口的地方，但是妄圖統治世界者和新戰爭挑撥者却企圖掩飾自己的帝國主義意圖，開始誣指蘇聯有侵略的念頭，甚至有侵略的行動。他們故意忽略了這一簡單的真理，即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本性與侵略是兩個完全不相容的概念。然而，這個真理也好，證實蘇聯愛好和平政策的顯著事實也好，與他們是無關的；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以反蘇的謊言和誹謗來混淆視聽，以便更容易地幹他們那

些卑鄙齷齪的勾當。

上流對斯大林同志的詢問，在頗大程度內都是與西方拚命散佈反蘇的誹謗性的謠言有關的。一九四六年九月，英國保守黨報紙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惠爾斯問斯大林同志，是否相信『……蘇聯和西方各民主國家之間，儘管存在着思想上的差異，但有實行友好而長期的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是否相信……兩種體系之間的「友誼的競賽」？』又問斯大林同志是否認爲『……由於蘇聯向共產主義更進一步地前進，蘇聯與外界實行和平合作既然是和蘇聯有關的，那麼，這種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會隨着減少麼？』

約·維·斯大林肯定地回答了這些問題，他說：『絕對相信』，『我一點也不懷疑，這種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更會增進起來。』（斯大林：答惠爾斯所提的問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見斯大林論戰後國際形勢，中國人民大學版，第五六一—五七頁）

一九四七年四月美國共和黨活動家史達森向斯大林同志提出關於和平合作底可能性的類似問題，史達森提這個問題是很想知道蘇聯與美國之間的相互關係。當談到蘇聯和美國底經濟制度時，史達森問道，這兩種經濟制度能否『……共同存在於同一世界上並在戰後互相合作。』

約·維·斯大林回答史達森時指出：『因為問題是在於它們的合作』，所以如果有着合作底願望，這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接着斯大林又說：『假使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那末爲什麼不能在和平時期合作呢？當然，很清楚，假使願意的話，

經濟制度雖然不同，合作還是完全可能的。不過，假使不願意合作，那末即使經濟制度相同，兩個國家及人民還是可能交戰起來的。」（斯大林：與史達森的談話記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見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真理報；或斯大林論戰後國際形勢，中國人民大學版，第七四、七五頁）

但合作有各種各樣的，在合作過程中，國家之間彼此的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蘇聯僅僅承認這種合作，即它是建立在雙方完全平等、各種經濟制度平權的原則上的，它根本反對帶奴役性條件的合作。斯大林同志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說過：『帶奴役性的條件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二四頁。參看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三卷，第六八頁。）我們從來不接受這種條件，正如我們自己從來不以這種條件去強迫任何人接受一樣。蘇聯反對這種『合作』——它允許經濟上較強的一方干涉較弱的或根本弱小的對方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換句話說，它允許破壞這些國家底主權。

美利堅合衆國底實踐卻不是這樣。美國寧願與其他國家進行這樣的合作，即像騎者與馬的『合作』一樣，何況美國自然會把自己分配來充當騎者的角色，而以不體面的馬的角色去滿足自己對方的當事者。現在，美國利用國會在一九四八年援外法案底形式下通過的、臭名遠揚的『馬歇爾計劃』與歐洲各國的『合作』，就是這種『合作』最鮮明的例證。美國用使其他國家馬歇爾化的辦法，靠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而謀取自身的幸福，美國在這些國家中就像在自

已國內一樣地主宰一切；這些國家底政府爲了維持對本國人民的統治，就接受了美國的『援助』，因而也就使這些國家陷入被美帝國主義奴役的地位。最橫蠻地被干涉和束縛在『馬歇爾計劃』下的十六個西歐國家的內政和對外政策，以破壞它們的工業來代替應許給它們的工業復興，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美國式的『合作』的榜樣，這就是這種『合作』底結果。

英國也是這十六個國家中的一個，但它是與其餘國家不同的，因爲它是美國底小夥計；它雖然也在美國的保護之下，但是它也跟美國一起妄圖統治全世界。這兩國的帝國主義者的結合，乃是『最反動的、最瘋狂的、摧殘所有弱小民族的、恢復全世界反動勢力的英美帝國主義』，它正在巧妙地學會利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三頁）

列寧在三十多年前對英美帝國主義所下的這個明確中肯的評語，在今天依然是現實的。

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會拒絕接受奴役性的和蹂躪他國主權的『馬歇爾計劃』。英美戰爭挑撥者們，特別利用這個『理由』，說什麼彷彿與蘇聯合作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美英兩國那些鼓吹侵略政策的人們，並不關懷他們與蘇聯取得協議，和與蘇聯合作。他們所要的不是協議與合作，而是談論協議與合作，而又阻撓協議，反而歸咎於蘇聯，並藉此「證明」與蘇聯合作是不可能的……。「表明」有新戰爭的必要，從而爲發動戰爭準備條件。』（斯大林：關於柏林局勢問題答真理報記者。見一九四八年第二〇期布爾什維克雜誌；

不論國際合作的方法怎樣，國際合作也像廣義的一般國際交往一樣，要求一定的法律形式。國際交往的這種經常的法律形式的需要，是從國際聯系開始產生和發展時起，便產生並形成的；在國際聯系的過程中，便進行着國際合作與國際鬥爭。國家之間鬥爭與合作底最普遍的法律形式是國際條約，它是兩個或幾個國家之間在政治的、經濟的及其他關係的領域內的協定。國際條約是國際法底基本淵源，它的規範調整着這些關係，規定締約國在它們相互關係底某種領域內的彼此的權利和義務。

蘇維埃國家自其與外界建立聯系時起，就把國際條約作為在法律上確定並鞏固與他國業務聯系的方式。但蘇維埃國家早在這些聯系開始建立以前，即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產生了它的第二天，就決定了自己對待國際條約的態度，這種態度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有着原則上的區別。蘇維埃政府在列寧親自制定的和平法令中，公開宣稱廢除秘密外交，並表示「決意在全體人民面前完全公開地進行一切談判，立刻着手把地主資本家政府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至十月二十五日止所批准或締結的秘密條約完全公佈出來。既然這些秘密條約底全部內容——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法令中繼續說道——往往大半是使俄羅斯地主

和資本家獲得利益和特權，使大俄羅斯人保持或加強兼併，所以政府宣佈這些條約無條件地立刻作廢。」（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一八——二一九頁。參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七三頁）

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寧在論目前時局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布爾什維克政府「把公佈、揭發以及將秘密條約加以公開的唾棄認爲是自己的首要責任」，同盟國爲這些秘密條約進行着戰爭，「受孟什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底幫助與支持而存在的克倫斯基政府，不僅不廢除，甚至也不公佈」。在這些秘密條約中「允許俄國地主和資本家們在勝利時奪取君士坦丁堡、海峽、里沃夫、加里細亞和阿爾明尼亞」（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三九、四四〇頁）。公佈秘密條約是社會主義政府「真正的革命舉動」（同上，第四四〇頁）。

蘇維埃政府宣佈沙皇俄國所參加的帝國主義秘密條約無效，並公佈了這些條約，接着就聲明沙皇外交當局所締結的，旨在掠奪他國領土的，以及限制並束縛其他民族自由和獨立生存權利的不平等條約一律作廢。斯大林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寫道：「讓俄羅斯各民族知道，俄國革命及其政府根本反對侵略的企圖。讓他們都知道，人民委員會是以徹底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來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政策。」（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二六頁）

蘇維埃政府關於蘇維埃政權的對外政策，特別是關於廢除秘密和不平等條約的宣言，立刻就被蘇維埃政府底措施所證實了。例如從波斯和土耳其撤回俄國軍隊。波斯政府對於人民委

員會廢除旨在反對波斯獨立的一切協定，以及將軍隊撤出波斯國境的決定表示感謝。

強國強加於弱國和附屬國的奴役性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底變種。蘇維埃國家一開始就採取了堅決否定這類條約的立場。一九二二年蘇維埃政府與英國工業家伍爾卡爾特進行了關於締結開採烏拉爾和卡查赫斯坦礦產租借合同的談判。由於伍爾卡爾特建議的合同方案所包含的條件帶有奴役性質，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就被人民委員會拒絕了。（參看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一四八頁）

蘇聯的對外政策也同樣地執行着蘇維埃國家對內政策底最重要原則之一，即居住蘇聯境內各民族充分平權的原則，這特別是表現在蘇聯履行條約的實踐中。不論某一個國家是多麼小，當蘇聯與它建立政治的或經濟的關係時，蘇聯總是從雙方平權底原則出發的。這本來似乎是國際交往底起碼規則，但在帝國主義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係中却是陌生的。一九四八年四月七日蘇芬友好互助條約簽訂時，斯大林同志在歡宴芬蘭政府代表團的演說中說道：「許多人不能相信大國與小國之間能有平等的關係。但是我們，蘇維埃人們，却認為這種關係是能夠有的，也是應當有的。」（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三日真理報）

平等的關係應當伴隨着平等的條約。斯大林同志在上述演說中又說：「條約有平等的和不平等的。蘇芬條約是平等的條約，因為它是在雙方充分平權底基礎上締結的。」（同上）蘇聯過去與他國所簽訂的一切條約，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締結的，而將來也仍然如此。這完全符合蘇

聯及其所領導的民主陣營的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目的；這目的是在互相尊重國際合作的一切參加者底權利和利益的基礎上，及尊重並遵守各民族獨立和主權平等原則底基礎上鞏固國際合作。祇有這種政治方針才能保證『各民族底和平與安全，平權國家之間友好的業務聯系，以及用集體的努力來防止侵略和反對任何侵略，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藉助於軍事優勢的經濟和政治的壓力來解決爭端問題底企圖。』（維辛斯基：國際法與國際政治諸問題，國家法律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第四五三頁）

美國及其所領導的反民主陣營所奉行的是另一種對外政策方針，它是較強國家不尊重較弱國家的主權，強加自己的意志於它們頭上，但却總是假惺惺地冒充爲合作。美利堅合衆國不但橫蠻地干涉弱小國家底政治和經濟生活，而且也干涉像英國這樣文化和經濟發達的大國；美國對於發展這種『合作』，表現得特別積極和堅持。在美國強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經常有『機會均等』的字樣，強調互相平等和互利。可是在經濟上軟弱的國家中賦予資本主義大國以『機會均等』，帶來的祇能是這個國家民族工商業底破產，和不可避免地遭受外國資本的奴役。這實際上已經發生在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實踐中，其中包括根據『馬歇爾計劃』而簽訂『援助』條約的歐洲國家。這些條約是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奴役這些國家的法律形式。還可以指出，一九四六年美國與『獨立的』菲律賓所簽訂的通商協定，及一九四六年美國與國民黨中國所締結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是美國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標本。中國報章在評論中美締

結的條約並指出其不平等的性質時，指出：『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條約像這樣露骨而殘酷地蹂躪中國民族底主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真理報）

蘇聯底對外政策，正如上文所指出，堅決反對任何干涉他國內政底可能性，不准強迫他國接受任何不能接受的或不平等的條件。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合作，是這方面的範例；這種合作與美國和馬歇爾化國家及附屬於美國的其他國家之間的『合作』，有着原則的區別。蘇聯與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合作，是在幫助後者迅速恢復並發展其國民經濟，促進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從而也幫助它們建立起民族獨立底鞏固的經濟基礎。在蘇聯對各人民民主國家底供應中，工業裝備和貴重的工業原料佔主要地位。由於蘇聯與這些國家之間，以及這些國家彼此之間的商品流轉，更在這些國家中產生了新的工業部門，建設起生產生產資料的新工廠。

蘇聯所締結的國際條約的特點，就在於它們是真正的和有效的和平工具。它們不威脅任何人，它們的目的是鞏固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和防止侵略；它們的基礎是承認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底主權、獨立和民族利益。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而法西斯國家已經大規模準備戰爭的時期，蘇聯締結了一系列的條約，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和平與反對戰爭威脅。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分析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與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的時期中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和政治狀況時說道：『資本主義國家是在瘋狂地準備着重新分割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新戰爭，而蘇聯却一貫繼續進行着堅決鬥爭反對戰爭危

險，維護和平，而且不可說蘇聯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獲得什麼成功哩。」（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六三頁。）在這個艱巨而複雜的維護和平的鬥爭中，蘇聯過去與現在都指靠自己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政治的威力；指靠像蘇聯勞動人民一樣切身關懷保衛和平的全世界各國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方面的支持；蘇聯過去與現在都指靠那些國家底審慎態度，這些國家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由於某種動機而不願破壞和平，並願意與蘇聯這樣一個守信的主顧發展通商關係」；最後，蘇聯過去與現在都指靠決心擊退外來敵人攻擊的光榮軍隊。因此，蘇聯過去有、現在仍然有爲和平而鬥爭的充分現實的基礎——物質的和精神的基礎。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說道：當時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我們力求與各鄰國締結互不侵犯公約和侵略國定義公約的運動」。斯大林同志指出這運動底成就時說：「大家知道，我們不僅和我們西方和南方大多數鄰國——包括芬蘭和波蘭在內——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而且和法意這樣的國家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關於侵略國定義的公約，我們也和這些鄰國——包括小協約國在內——締結過了。」（同上，第五七七頁）

當瘋狂的備戰發展爲戰爭（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略並佔領阿比西尼亞，一九三六年夏德國和意大利武裝干涉西班牙，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華北和華中）後不久，在這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擴大的過程中，蘇聯就締結了一系列反對侵略者的可能侵犯的互助條約。一九三五年五月，蘇聯與法國，以後又與捷克斯洛伐克締結了這樣的條約，一九三六年五月，蘇聯與蒙古人